



21世纪人类学文库

中国

The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inority Dan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少数民族舞蹈的采集、 保护与传播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项社会人类学调研



何国强 许韶明

「美」费鹤立

译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21世纪人类学文库

中国

The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inority Dan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少数民族舞蹈的采集、 保护与传播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项社会人类学调研

[美] 费鹤立 著
何国强 许韶明 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采集、保护与传播: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项社会人类学调研 / (美) 费鹤立著; 何国强, 许韶明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21世纪人类学文库)

书名原文: The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inority Dan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BN 978-7-5482-0289-9

I. ①中… II. ①费… ②何… ③许…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舞蹈—调查研究—中国 IV. ①J7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1751号

责任编辑: 蔡红华

和六花

责任校对: 何传玉

封面设计: 刘雨

中国

The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inority Dan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少数民族舞蹈的采集、
保护与传播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项社会人类学调研

[美] 费鹤立 著

何国强 许韶明 译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96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289-9

定 价: 30.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21世纪人类学文库》编委会名单

主 编：尹绍亭 施惟达 周大鸣 瞿明安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京 方 铁 王建新 尹绍亭

邓启耀 刘昭瑞 杨 慧 何国强

沈海梅 张 实 周大鸣 周永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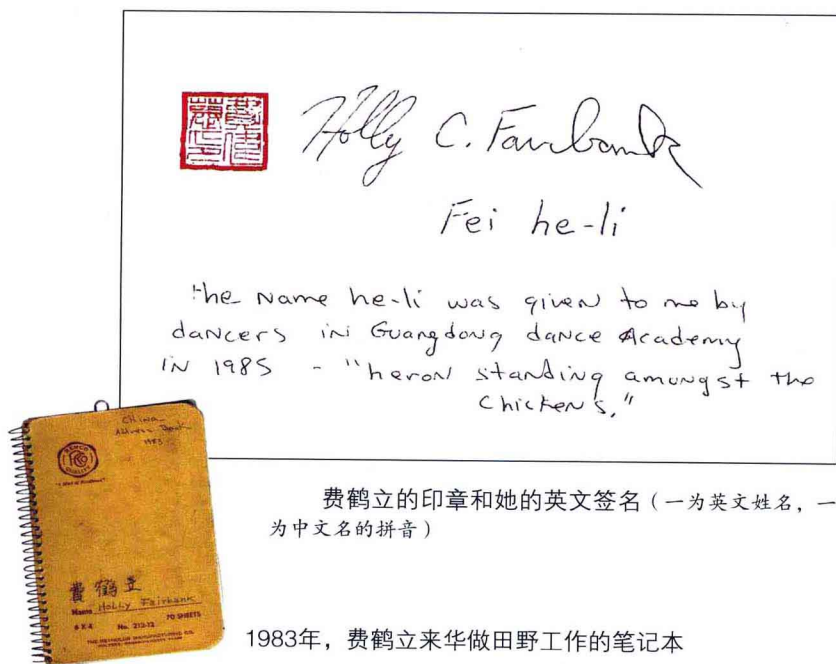
施惟达 麻国庆 蔡红华 瞿明安



费鹤立近照（摄于2008年）



2008年夏天，费鹤立在香港参加“运动和舞蹈的全球展望”研讨会，坐轮椅者为德雷得·威廉姆斯教授，鹤立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国际知名舞蹈学家。



费鹤立的印章和她的英文签名（一为英文姓名，一为中文名的拼音）

1983年，费鹤立来华做田野工作的笔记本



1985年6月，费鹤立获得纽约大学舞蹈学硕士学位，与父母在哈佛大学的家中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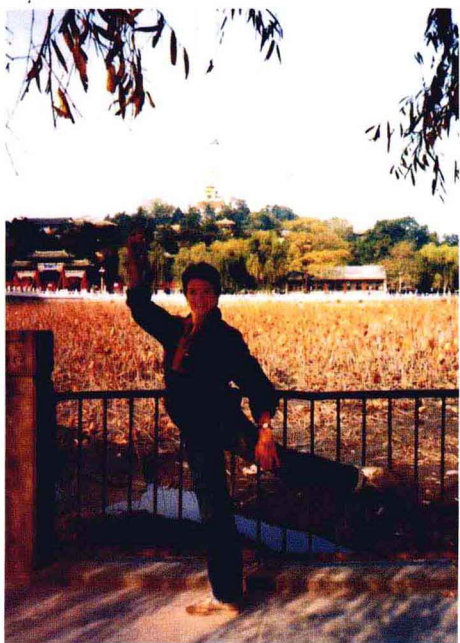
1984年费鹤立与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女士在纽约的合影



费鹤立、朱迪思·夏比罗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研所与著名舞蹈研究员周冰合影



费鹤立正在访谈民族舞蹈研究工作者



1983年费鹤立在北京北海公园一展舞姿



湖南歌舞团演员表演苗族舞蹈



1988年费鹤立在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大专班传授舞蹈技巧（1）



1988年费鹤立在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大专班传授舞蹈技巧（2）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总序

中国的人类学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重建，到 90 年代以来，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学科的骨干力量。这些学者大多集中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其中许多人在国外求学数载，直接沟通了中国和世界的研究。

2. 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期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有的高等学校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学科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这种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同时，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更易于



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同时，有关人类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大大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达七十余次。这些高层次的研讨会既整合了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又扩大了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

3. 学科建设取得重大成绩。2002年1月，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的民族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这为新世纪人类学民族学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全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如中山大学有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有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获得了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相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分别开展了规模较大的科研项目，特别是云南大学先后两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村寨调查，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出版了一套完整的民族村寨调查丛书。中国的人类学界必将以丰硕的研究成果，迎接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中国（昆明）的召开。

4. 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及已开始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说过，人类学是改革者的学科，人类学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学科。费孝通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来看，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应用性，到90年代已能直接介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人类学专家在区域文化策划、综合社会评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西部大开发中，人类学专家参与的民族省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人文旅游规划、文化设计和社会评估已多次用于云南、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区的政府咨询和决策。

另外，由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特殊的资源优势，人类学学科较易于直接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如人类学者直接参与社会发展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批人类学者参与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华的发展项目的评估。在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参与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对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人



类学家参与的艾滋病与人类行为的研究，云南大学人类学家主持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中山大学对江西、新疆、甘肃、宁夏、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等地的社会评估，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类学对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学在行动”。

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比如说，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他们的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及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这是知识回归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我们消解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

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为了适应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和本土化发展的需要，由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组织有关学者编写了一套反映当代人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系列教材《21 世纪人类学文库》。厚积薄发，正是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使今天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蔚为大观。这一套教材凝聚着编著者的心血，而长期以来许许多多人类学者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今日学科发展的汪洋大海，则是这一套教材编写的不竭源泉。“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如果说弗雷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为期不远的话，我们愿这一套教材的出版能引导更多的雏凤走上对人类学的不懈追求之路，催生人类学的中国时代！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编委会

2005 年 10 月



威廉姆斯序

德雷得·威廉姆斯

费鹤立 (Holly C. Fairbank), 1953 年 9 月 2 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1985 年 3 月在纽约大学通过硕士论文答辩, 题目为《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采集、保护与传播》, 这篇论文经过多次修改和充实, 改写成这本舞蹈研究的处女作。此书一直未在英语世界面世, 现在能够先译成中文付梓, 无意中应验了一句西方古话: “不在故乡的先知才会受到膜拜……”我引用这句话不是想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而是想说有价值的东西迟早会被人发现。我相信此书不仅能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对于舞蹈和人体动作的兴趣, 一如作者当初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研究怀有的兴趣, 而且能够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维度, 即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来了解中国的舞蹈艺术。据我所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在费鹤立从事该项研究期间, 世界上除了中国, 恐怕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政府能够意识到人体动作, 尤其是舞蹈的力量了。

鹤立的论文选题新颖而刁钻, 很大程度上与她的中国情结分不开, 若无浓厚的兴趣、持久的热情和冷静的思考, 很难想象她会提炼出那么有价值的主题。鹤立的父亲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 5. 24—1991. 9. 14) 被一些人誉为“汉学巨擘”, 哈佛大学用他的名字开设了中国文化讲座。1983 年, 鹤立赠送给我一册费正清写的回忆录——《心系中国: 50 年的回忆》^①, 记述了费正清夫妇对中国的炽热感情。鹤立

^①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e, 1982.



的母亲费伟慕^① (Wilma Fairbank, 1909. 4. 23—2002. 4. 4) 于 1945 年由美国外交部派到中国任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 她的艺术才华和对中国古建筑的了解令中外人士折服。费鹤立自幼熟知中国, 在选题中国舞蹈研究之后, 她一直希望为自己的论文找到富有内涵而又意义深远的重心。很幸运, 鹤立的朋友朱迪思·夏比罗^②将自己对中国舞蹈的所见所闻讲给她听。不仅如此, 夏比罗还给鹤立指出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捷径, 因为她深知中国舞蹈家当时对民族舞蹈抱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按夏比罗的设想, 如果鹤立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 那么从研究的起点开始无疑就站在了研究中国舞蹈的前沿。难得夏比罗一片深情厚谊, 在鹤立做研究期间, 她始终陪伴在鹤立身边, 不仅充当向导, 而且担任翻译。

不少醉心舞蹈研究的人惯于隐身于群众之中, 他们的活动与兴趣几乎不为广大人民所知晓, 更别说让他们了解本书所涉及的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的政策, 以及各种充满生命力的文件、档案与舞蹈之间的关系了。在社会主义中国, 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那些认定需要加以保护与传播的民族舞蹈的原型。从更广的意义上说, 在任何国家, 政府的能动性都是有目共睹的, 因而不可避免地舞蹈产生重大的影响。

目前, 中国人开始积极探索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野。而一个西方的舞蹈研究者, 能够在 25 年前就有这样的认识——指出中国政府的舞蹈采集、保护与传播的计划多么宏伟——这是何等的幸福! 20 世纪 80 年代, 由于环境的限制, 让中国人反思自己的舞蹈习俗, 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 当时许多人对费鹤立的工作抱着疑虑的态度。然而这项工作毕竟圆满地完成了。

① Wilma Fairbank 的中文名也叫做“费慰梅”, 本书根据费鹤立发来的印章印迹和她的说明, 采用“费伟慕”这一中文名。——译者

② 朱迪思·夏比罗 (Judith Shapiro, 1953—), 中文名夏竹丽, 父亲是美籍犹太医生, 母亲是大学教授。夏比罗生于纽约, 1975 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 同年到伊利诺大学, 1977 年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后转入伯克利大学, 1979 年获亚洲问题研究硕士学位, 同年来到中国, 在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书, 并参加艺术系的教学活动, 是年邂逅该校汉语言文学系 77 级学生梁恒 (1954—), 1981 年结婚, 翌年一同赴美, 现俩人已离异。1983 年夏比罗通过梁恒口述, 写成 *Son of the Revolution* 一书, 以俩人的名义在纽约出版。——译者



在那个敏感时期，鹤立获得特殊的恩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正式批准了她的研究计划，并为她来到北京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接待会。鹤立认为自己能够挣得这点颜面，至少某种程度上尽到了维护家族名望的义务。想到今后的研究要开花结果，对得起这场隆重的接待会，还要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让中外舞蹈界满意，鹤立的心情可不太轻松。可以预想的是，这项研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别的暂且不论，一个较大的难点在于汉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他们不喜欢展示人体动作。必须承认许多少数民族在这一方面做得极为出色。文化的差异体现在舞蹈创作中，最终导致了两种原则性的趋向——“保护”与“加工”，相信热忱的读者会看到这一点。在此我愿意遵循鹤立的解释逻辑，援引本书第6章的一段话：“加工者首要关注的，是把各民族的民间舞塑造成适合于广大群众享受的精神产品，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去分析这些舞蹈的内容与文化背景。加工者的使命是整理、编辑来自乡野草莽中的舞蹈原型，然后传播这些经过加工的舞蹈素材，满足文化交流的利益。但这样做或迟或早会消除舞蹈的多元倾向，引来文化的同质性。一位观摩人在北京的教室里所看到的舞蹈和发生在田野场景中的动作和意义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他看到供给大众消费的舞台表演，美其名曰‘民族舞’或‘民间舞’，其实这些节目是编导随心所欲地剪裁原生态的民族舞或民间舞，不断植入一些芭蕾元素的拼凑。它们已经不是原来的舞蹈了，顶多只有一点模糊的影子。”^①

25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捧起鹤立的论文，能够在脑海里捕捉到的印象恐为第6章的一句话——“少数民族舞蹈的加工者和保护者”，由于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舞蹈的核心，所以我的记忆犹新。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我在珠海一所以英语教学为主的学院里任教，每当我在中国电视上看到贴上“民族舞蹈”标签的节目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鹤立的研究。她所提到的文化同质性的确降临在我们面前。不仅如此，编舞者根据自己的爱好切割少数民族舞蹈，达到加工的目的，这就算完成

^① Holly C. Fairbank. *The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inority Dan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ster's Thesis, New York University. 1985; 并参见本书第78页。



了“保护”或“美化”民族舞蹈的任务吗？

消极的方面说到此，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舞蹈保护者继续工作，因为只有他们不停顿地工作，往昔千辛万苦记录下来的民族舞蹈才能获得新生，也就是说，这些栩栩如生的记录才能转变为精彩纷呈的现实。现在，许多参加过民族舞蹈实地调查的人已经谢世，为了加强舞蹈研究，也许新一代的舞蹈学者需要重新走向田野，一如鲁迅所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①

与此同时，我要祝贺本书的译者——何国强教授和许韶明博士——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果实；保罗·霍金斯^②教授特别值得称道，是他把此书推荐给何教授的。后来他俩联袂从大处着眼考虑人类学和舞蹈研究的结合；从小处着手寻找合作人，联系出版业务，终于为这本书找到了“娘家”——云南大学出版社。借此机会，我要向这家出版社和批准出版发行的政府部门表示感谢。

费鹤立记录了中国在保护舞蹈方面所作的努力，提出了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这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毋庸置疑，中国政府在民族舞蹈和民间舞蹈的保护与传播工作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这一切都是可以用时间来换算的，虽然里面有一些扭曲的片断，但所有的曲解都是可以改正的。那些与费鹤立一样挚爱中国的人们，希望历史不要忘记这一点。

该书阐述了保护任何一个民族的舞蹈所必需的卓识远见、精细的技术和科学的程序。因此就资料的参考性而言，该书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至于该书对舞蹈专业的学术影响，目前还不能断定。但可以肯定，对于其他形式的舞蹈研究而言，该书是一个里程碑，因为谁也不清楚那些研究者做了什么事情。在第1章的末尾处，鹤立充满感情地提醒和勉励中国舞蹈工作者：“仅仅依靠学习舞蹈，耐心地聆听报道人的诉说，

① 参见鲁迅《伪自由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又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译者

② 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1935—），英国人，伯克利大学人类学博士，长期在南印度和西爱尔兰从事田野调查，同时在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工作，2002年荣誉退休。他是德拉威语专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擅长医学民族志和视觉人类学，著作颇丰。1997年受聘于云南大学，同年该校出版了他的《影视人类学原理》一书，2007年修订再版。——译者



运用常识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不幸的是，这些却是当前大多数中国舞蹈保护者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有可能运用更为缜密的理论，采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舞蹈。中国的舞蹈研究方兴未艾，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蔚为可观，且由来已久，并已完成大量有价值的工作。有鉴于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将帮助新的研究取得进展，使中国舞蹈日臻完善。”

以上也是我的真诚愿望！

2010年1月8日

德雷得·威廉姆斯（Drid Williams，1928—）是享誉世界的美国舞蹈学家，也是费鹤立读硕士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威廉姆斯年轻时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后来到纽约市当专业舞蹈演员和舞蹈教师，之后去了非洲的加纳作田野研究；1970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得到人类学大师埃文斯-普里查德教授的悉心指点；1979年在埃德温·阿登勒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人类学的博士论文，之后在纽约大学、悉尼大学、莫伊大学（肯尼亚埃尔多雷特）、国际大学（肯尼亚内罗毕），以及明尼苏达大学、多伦多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28号）执教。威廉姆斯长期致力于人体动作、表情与沟通的符号学研究，是《人类动作研究》期刊的创始人和高级编辑。她出版和发表了《人类学与人体动作》、《人类学与舞蹈》、《超越生存的舞者》等多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除此之外，威廉姆斯教授的研究领域还包括非洲人类学、非洲艺术、典礼和礼仪。



由衷的喜悦与诚挚的祝贺

费正清

当费鹤立所著《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采集、保护与传播——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一项社会人类学调研》一书的中文译稿豁然展现在眼前时，我不禁为之一惊。22 年前的情景悄然浮现于脑际：我在美国见到鹤立，她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对中国民族舞蹈的兴趣，我却没有在意，仍把她看成一个谙熟芭蕾、从事舞蹈教育和现代舞编导的小妹，绝未想到当时她已走上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舞蹈之路。正是在这个领域，她尤为青睐中国民间舞蹈。至于原因，我就不详述了，读者可以想象，如果她不是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庭——其父费正清先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始已被誉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如果我国没有如此之多的民间舞蹈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也许她就不会对中国产生兴趣与好奇，更不可能促使自己去继承家学和父母的“中国情结”，当然，她也就不可能在 80 年代选择中国民族舞蹈来研究了。

鹤立对中国舞蹈的关注和倾注的心血，表现在她通过多种渠道深入了解中国舞蹈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状况；由衷地赞赏新中国为复兴与发展民间舞蹈艺术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来华考察、观摩教学后，根据自身体会提出了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的友善建议。一个美国舞蹈人，能够执著于中国舞蹈长达二十余载，使我在肃然起敬的同时深感心中那位年轻女性，已成长为舞蹈研究专家了。

使我尤为高兴的是，鹤立在讲民族民间舞蹈素材的采集、加工时，强调被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舞蹈背后所具有的文化底蕴的关键因素，是调查者绝对不能忽视的。而这个

